

论建国初期翻译工作的组织化和计划化 ——
以“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及其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为中心
= On the organization and planning of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early 1950s : using "The First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ranslation" as an example

崔峰 Cui Feng

2013

Cui, F. (2013). 论建国初期翻译工作的组织化和计划化 ——
以“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及其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为中心 = On the organization and planning
of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early 1950s : using
"The First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ranslation" as an example. In B. Song (Ed.),
润物有声：谢天振教授七十华诞纪念文集. Shanghai, China: 复旦大学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

<https://hdl.handle.net/10356/83285>

© 2013 复旦大学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aper was
published in 润物有声：谢天振教授七十华诞纪念文集 and is made available with permission
of 复旦大学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

Downloaded on 21 Jul 2024 09:56:57 SGT

论建国初期翻译工作的组织化和计划化

——以“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

及其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为中心

崔峰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

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起国家政权。在随即发展的“十七年”间，国家权力话语深入影响和操控了文学翻译活动。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建国初期，共产党即开始对翻译工作系统地实施组织化与计划化的努力紧密相关。1951年召开的“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具体规范了文学翻译活动在“新政权”下的活动方式与生存状态；对整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翻译活动的展开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时就设立了“翻译局”。1951年11月5日至11月12日，在翻译局的组织下，并召集全国各编译机构、各主要出版社的代表和各方面的翻译家共165人，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闻总署署长、同时又是毛泽东“钦点”的中共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胡乔木（1912-1992）在大会作了“制订译书计划，提高翻译质量”的讲话。指出“此次会议的目的有二：第一，计划化。第二，提高翻译质量。”¹那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翻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做出了哪些指示？这些指示如何贯彻实施？对其后全国的翻译活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胡乔木所提倡的“计划化”、“提高翻译质量”二者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我们从翻译局局长沈志远（1902-1965）针对今后翻译工作如何展开所做的指导性报告着手分析。这篇报告题为“为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提高质量而奋斗”。其中提及：新中国成立两年以来成立了出版总署编译局，它调查了全国

¹ 胡乔木《制订译书计划，提高翻译质量》，见《胡乔木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页2。

翻译工作者的情况和全国翻译图书的情况，并按月编印出版翻译新书目录；同时设立了《翻译通报》作为翻译界的专业性刊物，每月刊布各单位的翻译计划和翻译消息，供翻译工作者们互相沟通。这就为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组织化打下了基础。尽管如此，“新中国”的翻译工作毕竟还是刚刚起步，还没有实现组织化和计划化的目标，所以在具体的工作中还存在着“各种缺点”²。

这句话非常耐人寻味。首先，我们来观察一下“新中国”建国初期，翻译工作中确实面临的“各种缺点”是什么。

1950年3月26日，《人民日报》以《用严肃的态度对待翻译工作》为题，特发三篇文章指摘《萨根的春天》这篇苏联小说的译文中错误的地方。并以严厉的措辞指出：

翻译介绍苏联文艺作品，是当前文艺工作上重大任务之一，也是教育中国人民事业上的重要工作之一。广大读者迫切要求阅读苏联优秀文艺作品，而且热烈爱好这些作品，这种要求与爱好正在日益增长。出版家和翻译工作者应当以十分负责、严肃的态度来满足广大读者的这种需要。现在有些出版商，如上海时代书局，却出版一些粗制滥造、恶劣不堪的译本来贻害读者。这种现象是不好的，必须加以纠正。³

而当时的《翻译通报》上，几乎每期都会有就如何提高翻译实践的质量及针对某部作品字、词、句译笔优劣的讨论。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建国初期的中国翻译界缺少一支高质量、高水平的翻译工作队伍，很多作品粗制滥造、错误百出、晦涩难懂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翻译实践中的缺点和错误？如果我们仅仅从沈志远报告的字面意思来理解，即是要“实现组织化和计划化”，这层因果关系实在令人难以信服。首先，代表官方发言的沈志远、胡乔木所言的“计划化”究竟是什么？它们所需要解决的目标或者问题真的就是“提高翻译质量”这么简单吗？其次，如果我们凭从译者的个人翻译水准的角度来看，翻译实践中“信达雅”的把握⁴，很大程度上还是译者私人的问题。尤其是一些错译、乱译的现象，更

² 沈志远《为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提高质量而奋斗》，见《翻译通报》，第3卷第5期（1951），页10。

³ 《用严肃的态度对待翻译工作》，见《人民日报》（中国），1950年3月26日，版5。

⁴ 当时《翻译通报》中讨论翻译实践的文章，很多都是围绕“信达雅”的标准展开的。

是可以通过提高译者本人的外语水平而解决。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当时文艺界和翻译界的领导人眼中，“缺点和错误”有没有更重要的指称？组织化和计划化实质上要解决的是怎样的问题？

在 1950 年《翻译通报》创刊号中，有一篇董秋斯（1899-1969）的文章，直接以“略谈翻译工作的缺点”为文题，概况了当时翻译工作中“选择不精”、“辨别不明”、“态度不严肃”、“工作不认真”的四大缺点。而这些缺点造成的原因，按照董秋斯的说法就是翻译工作者没有对“通过翻译工作来为人民服务，加速社会主义的实现”这一主观愿望进行“正确”地实行。这种逻辑判断尤其体现在他对“选择不精”这一缺点的分析上。在他看来，选择译品首先要根据“广大人民的需要”，否则造成的结果就是“翻译出来的东西，难免驳杂不纯，往往含有毒素和不正确的见解，尽管译笔作到‘信、达、雅’，也还是不够负责。”⁵在这里翻译技巧问题已然不能成为翻译工作的主要“缺点”；甚至于在董秋斯看来，即使解决了技巧层面的问题，作品内容中“毒素”的不清除，就意味着翻译中最主要的“缺点”依然没有解决。而所谓“毒素和不正确的见解”文中也交代得很清楚：或是跟宣扬资本主义有关的，或是没有跟上社会主义苏联发展步伐的。

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出董秋斯的观念与当时整个中国文艺界文艺方针的紧密联系。自 1949 年“中华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正式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确定为中国文艺今后发展的指导方针，包括翻译活动在内的文艺工作被纳入国家体制运行的范畴后，翻译界也紧跟形势，提出了“全国的翻译工作者要遵循‘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而奋斗的共同的总方针，同时还要确定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建设而服务的共同的总任务。”⁶很明显，此时的翻译活动，已经不是 1949 年以前，一些翻译家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和个人审美的喜好，来决定译品的选择及体现怎样的翻译内容。一直到了 1954 年，中国作协召开“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茅盾（1896-1981）在做大会主题报告时，仍然谈到了“翻译工作中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和缺点，而首先是工作的无组织无计划状态”⁷，在茅盾看来这种“无组织无计划状态”是与过去那种由

⁵董秋斯《略谈翻译工作的缺点》，见《翻译通报》1950 年第 1 期，页 13。

⁶沈志远：《发刊词》，见《翻译通报》，第 1 卷第 1 期（1950），页 2。

⁷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见《译文》，1954 年 10 月号，页 5。

“译者个人主观好恶”、“私营出版商”来决定翻译什么作品的现象直接相关联。⁸

在翻译活动已经被纳入了“国家意志”的范畴之后，也就不难理解，董秋斯要从“人民的”、“进步的”立场来归纳翻译的主要缺点；也更能认识到在当时文艺、翻译活动的领导者心目中，翻译工作的“缺点”远不是仅仅指称技术层面上的翻译质量问题，更是直接指向了那些脱离主流意识形态导向的翻译活动和现象。

以此观点我们再重新来看《人民日报》上的那篇《用严肃的态度对待翻译工作》就可以发现，虽然此文对译本的“粗制滥造、恶劣不堪”提出了批评，但它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即是这些译作是在介绍苏联的文学作品。而对苏联文学的译介是当时整个中国文艺界、翻译界的工作中配合国家政治活动的重中之重。通过对苏联文学的介绍达到为整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更是矛盾在《译文》“发刊词”中提出的指导性原则。所以，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从技术层面理解“粗制滥造、恶劣不堪”的后果所在，实则是因为这些译作本身及当时的翻译活动所肩负的政治使命，不能容忍这种技术性缺点的存在。

所以当时一些翻译家在分析自己译作中的错误时，首先“检讨”的是“政治水平低”，其次才是“俄文修养太差”、“中文修养太差”、“缺乏自然科学知识”⁹。而在会议召开不久就开始的“三反运动”中，受此影响的翻译界更是出现了从意识形态“正确”与否的角度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现象。¹⁰那种认为“我在翻译工作中也表现出资产阶级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思想”而导致“我的俄文程度、翻译经验和理论水准都很低下”¹¹的自我检讨比比皆是。很

⁸ 同上，页 6。

⁹ 梁志安《“苏联的科学”三个译本和自我检讨》，见《翻译通报》第 1 卷第 2 期（1950），页 23。

¹⁰ 《翻译通报》于 1952 年 4 月就专门办了一期“三反运动中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辑”。该刊“前言”中称“本刊这一特辑并不是翻译界三反运动的总结，这仅是一个开端”，“翻译界的三反运动原是翻译界思想改造运动的一部分，在我们前面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翻译通报》，1952 年 4 月号，页 3。）

¹¹ 高晶齐《检讨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见《翻译通报》，1952 年 7 月号，页 10。

显然，这些翻译家也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在翻译工作被纳入体制与计划之内后，译作修辞水平的高低远不如摆正政治立场来得重要。

所以，翻译工作的计划化与翻译质量的提高，二者之间就不可能是各自独立的两个方面。当定义“翻译质量”的外延被延伸至意识形态的层面之后，前者成为后者必然的解决方式。正如沈志远在会上所言：要提高今后翻译工作的质量，需要“切切实实地适合国家的需要来有计划地进行工作”¹²。对于“意译”还是“直译”、“宁信而不顺还是宁顺而不信”这类的争执，需要“原则性的翻译理论和正确公认的翻译标准”，“抽出条理，找出规律……作为我们翻译工作实践的指针”¹³。这里所谓“公认”的翻译标准和“正确”的翻译理论，无非就是得到组织认可、可以运用到计划内翻译活动中的标准与理论；由此通过体制运转的方式保证翻译作品在意识形态范畴下、与政治使命相结合的“高质量”。无独有偶，董秋斯在为《翻译通报》做的“半年工作回顾”中又明确提出：

这三个根本问题（指成立翻译工作者自己的组织；编制全国性的翻译计划；建立翻译工作的统一领导——引者注）不解决，一切提高翻译水准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一类口号，是无法兑现的。反过来说，只要这三个问题得到适当的解决，其他枝节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¹⁴

在翻译工作已不再是“私人的事情”之后，翻译质量的提高——这一本来与翻译家的个人翻译水平息息相关的命题，本来与“计划”和“组织”并无直接因果关系的命题，¹⁵也被人为地剥离出私人的范畴，而置于“集体”的话语之下。以至于有的翻译家在被指出译作中的错误后，要诚惶诚恐地“向党、向解放社、

¹² 同注 2，页 15。

¹³ 同注 2，页 16。

¹⁴ 董秋斯《本刊半年工作回顾》，见《翻译通报》，第 1 卷第 6 期（1950），页 4。

¹⁵ 从晚清至民国时期，当翻译还是“私人的事情”时，就出现了一批翻译质量上乘的译作。且至今被人津津乐道，并甚至奉为翻译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以致令今天的翻译家在翻译技巧、文学审美等层面仍无法逾越。

向读者谢罪”¹⁶；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组织化成为翻译质量提高的根本基础和绝对前提。

这种通过计划与组织的方式保证翻译质量的提高，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办的第一份主要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期刊——《译文》的办刊初期，所实行的“编校分离”的运行方式中，得以充分体现。作为当时负责《译文》日常工作的副主编董秋斯也无疑将他对翻译工作的种种观念带进了《译文》的日常活动中。

二

当翻译工作被纳入体制和集体运作的范畴之后，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是如胡乔木所号召的如何“通过一种制度把翻译工作者团结起来”¹⁷，以“可以按政府和人民的需要来组织翻译工作”¹⁸。如何实现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组织化就成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

沈志远在大会报告中这样说道：

确立必需的工作制度：执行全国翻译计划，如果没有各种健全的制度是不可能的。树立各种健全的制度，是执行全国翻译工作计划的有力保证……（所以国家）首先是对国营、公营和公私合营的翻译出版事业必须确定一定的管理制度。

……

各公营或私合营出版社，须依各自专业方向及自身力量，分工合作，共同参加全国翻译计划的执行，并将各该出版社的翻译计划及执行情况，定期呈报主管机关。这也是实现计划化所要求的制度。¹⁹

我们可以看出，身为翻译局局长的沈志远格外强调了通过加强翻译出版业的管理，以达到翻译工作的计划化与组织化。

¹⁶ 何思敬《感谢与纠正》，见《翻译通报》，第1卷第3期（1950），页15。

¹⁷ 同注1，页7，

¹⁸ 同注1，页1。

¹⁹ 同注2，页15。

其实沈志远对翻译出版运作和管理的重视，并不是在这一次翻译工作会上首次提出，在 1950 年《翻译通报》创刊时，他就对 1949 年前翻译出版的市场化提出了批评：

旧中国的翻译工作，正如旧中国的其他一切事业部门一样，完全是无组织、政府的。每个翻译工作者，都把译书当作自己的私事来进行；每一出版家，也都把翻译书刊当作普通商量来买卖。译作者是为了生活，翻译者是为了利润，私人的利益推动着一切。该翻译什么样的书，该怎样进行翻译工作；该采取怎样的方法来译书出书，那类书该多译多出等等，这一切都是翻译者或出版这个人的私事，谁也不能去过问，市场的情况决定这一切。这种情况到今天自然就不能再容许其继续存在了。适应着新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要求，我们的翻译工作必须来一个彻底的大转变：从散漫的盲目的状态转变为有组织有计划的状态。²⁰

无独有偶的是，在 1954 年“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号召文学翻译也要计划化和组织化的矛盾，提出的观点与沈志远出奇地一致：

在过去，极大多数的文学翻译工作，是在分散的、自流的状态中进行的。从翻译工作者来说，翻译作品的选择，常常是凭译者个人主观的好恶来决定，而往往很少考虑所翻译的作品，是否值得翻译，是否于读者有益，为读者所迫切需要……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出版事业掌握在私营出版商手里，翻译作品的能否出版，主要是由出版商人来决定的，这些出版商人及其雇用的编辑工作者，不可能对文学艺术有较高的理解，而对于作品的政治、思想教育意义，则更少考虑，他们的决定就很难符合于读者的利益；同时既然译稿的取舍由出版商人来决定，许多译者就不得不迁就商人们的要求，而不可能周密地考虑自己的志趣、能力和读者的利益。在某些情况下，个别的出版社或文化学术团体，也曾打算有计划地组织译稿，但由于这些出版社或学术团体的翻译计划的目的往往是不明确的，因而选题常常杂乱无章；又由于这些

²⁰ 同注 6，页 2。

出版社或学术团体的经济条件的限制，对于进行中的计划，也不可能给予切实的支持与保证，因而比较大的计划，就往往有始无终。²¹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沈志远和茅盾做出这样的论断实是情理之中。翻译活动，尤其是文学翻译，最终的成果是要通过出版机构的运作来完成和体现。然后再通过市场流通，呈现给读者，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可以说，从译品的择取，到读者的反应，出版是其间最核心的一环。规定了出版机构的经营模式，实质上就可以通过一定的“规范”，首先来决定某部作品能否成为潜在的出版对象；再由出版机构决定由谁来翻译；译稿出来之后，再先通过内部审查的形式，决定是否要对译作的内容进行“修正”，以达到某些“规范”的要求；最后，再通过考察它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意义和后果，决定是否将它推向市场，介绍给读者。以此角度理解，将翻译局设立在出版总署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但是，我们知道，无论沈志远还是茅盾都对 1949 年以前以市场为导向的翻译出版颇有微辞，在市场操控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考虑读者因素：读者喜欢读什么作品，什么样的作品才会有销路，这样出版商才能赢得利润。可以说，市场是最能保证读者利益的。而这却恰恰成为茅盾他们最为诟病之处：在他那里市场反而成为损害读者利益的罪魁祸首。那么什么才是读者的利益？茅盾理所当然的以国家的名义替读者们代言：作品的政治、思想教育意义才是读者们最需要从作品中获得的。而作品的教育意义正是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告诉”给读者的。因此需要阅读什么样的翻译作品，与其说是根据读者的需要，不如说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安排。这样翻译就再也不可能成为“私人的事情”了。这种文学出版与读者关系的变化，实质上就是 1949 年前后，“市场”与出版二者关系变化的直接体现。1949 年前，出版社多系私营，自负盈亏，读者对市场的反映是出版社利益攸关的参考因素，出版与读者通过市场紧密关联。而一旦出版事业国有化、计划化之后，出版社的经济盈亏由国家承担，利润高低不影响编辑部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²²与政绩考核。因此，沈志

²¹ 同注 6，页 6。

²² 正如有学者所言，当时社长、总编和编辑工资收入“财务上要求很低，有时也有利润指标，但不严格要求。各出版社实行统一的工资标准，不与利润挂钩”。（王益《出版、发行的分与合（一）》，见《中国出版》，1997 年第 1 期，页 14。）

远和茅盾眼中的“读者”实质上已经脱离于传统意义上，市场主导下的“读者”概念；而是趋附于“读者”背后的意识形态。

一言以蔽之，沈志远和茅盾都非常敏锐地看到了，只要整顿和控制了出版业的运行模式，就为翻译活动的计划化与组织化奠定了实质性的基础。而对出版机构的整顿和改造则是由出版总署完成的。1950年4月，《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的文件公布，要求全国的新华书店迅速走向统一、集中，加强专业化、企业化，以担任国家的出版任务，发展人民的出版事业，着重出版的内容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各种译著。²³9月，国家出版总署要求公私出版社逐步实现出版与发行分离、出版与印刷分离和出版专业化方针。12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三联书店和联营书店这5家最有影响的民营出版社的发行机构以及在全国80多个分支店，被全组为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成为新华书店以外的第二个全国性发行系统。1954年，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撤销，并入新华书店。至此，中共就建立起了统一的发行渠道。²⁴

以上海为例，晚清以降，上海渐渐成为中国翻译出版的中心。民国时期，上海堪称全国出版的“半壁江山”，并一直是翻译出版的重心所在。²⁵当时上海翻译出版界尽管也有各种非市场因素的介入，但在整体上是处在市场经济机制的支配下，因此是一个多元并存、鱼龙混杂的世界。翻译出版被当作生产普通商品的过程，译书大多在翻译家是作为私事来进行的。²⁶一些出版社还可以挂外

²³ 徐达深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一卷（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页208。

²⁴ 1950年4月，《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的文件公布，要求全国的新华书店迅速走向统一、集中，加强专业化、企业化，以担任国家的出版任务，发展人民的出版事业，着重出版的内容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各种译著。9月，国家出版总署要求公私出版社逐步实现出版与发行分离、出版与印刷分离和出版专业化方针。12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三联书店和联营书店这5家最有影响的民营出版社的发行机构以及在全国80多个分支店，被全组为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成为新华书店以外的第二个全国性发行系统。1954年，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撤销，并入新华书店。至此，中共就建立起了统一的发行渠道。（同注23，页208。）

²⁵ 邹振环《绪论》，见《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页17。

²⁶ 同上，页274。

国人的牌子而不受审查机构的监督，用自己的印刷厂排印出版。²⁷到 1951 年 9 月，上海还有私营出版社 391 家，中共入城后不久就对私营出版机构采取限制政策，以政治和经济手段迫其停业或合并。到 1956 年，上海全市的私营印刷厂都实行公私合营，被政府所控制。私营的出版业务在专业化的理由下合并。1955 年，上海硕果仅存的 80 家私营出版社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从此，出版机构基本上由政府包揽，所有出版机构均属国营事业单位。同人刊物不复存在，所有刊物都已机构化、政府化。²⁸

翻译文学的出版也在出版机构的整顿大潮中受到影响。像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中华书局这些有影响的大出版社，被规定了其出版范围，这些出版机构在 50 年代中期以后就不再出版翻译文学作品了。翻译文学作品出版要归新建立的国营出版机构出版，如人民出版社（含作家出版社，成立于 1951 年 3 月）、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中国青年出版社（1950）、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中国电影出版社（1956）、少年儿童出版社（1952）。如《译文》就归于 1951 年 3 月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就直接隶属于新闻出版总署。这样一方面可以加强出版的计划性，能统筹安排，另一方面有利于对外国文学翻译的选题、出版的控制。²⁹据有关学者统计，“十七年”间出版的 460 种英美文学译作，是由 53 家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文学（含作家）和上海文艺（包括其前身上海文艺联合和新文艺）两大家出版社出版的英美文学译作，恰好占出版总数的一半，而另有 35 家出版社，总共只出版了约 70 种。

30

一些跟翻译有关的刊物如《翻译通报》在外国文学出版计划化的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翻译通报》中的“翻译计划”、“翻译动态”等栏目，通过通报全国翻译工作者的工作及翻译局的翻译计划有效地控制了建国初翻译界重译、抢译的现象。例如，1950 年代前半期英美文学的一个热门翻译对象是美国“进步”作家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 1914—2003），有不少译者争

²⁷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上海：东方出版社，2003，页 235，263。

²⁸ 魏承思《中国知识份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页 73—74。

²⁹ 查明建、谢天振《中国 20 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上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页 560—561。

³⁰ 孙致礼《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页 185—186。

着翻译他的作品。天津有一位译者在《翻译通报》的“翻译消息”一栏中发布正在翻译《最后的边界》的告示后，“编者按”通报北京也有两位正在翻译，请天津的译者速与他们取得联系。联系结果是天津的译者放弃了翻译该书的计划。1950年代有五六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法斯特的作品，由于及时通报信息，没有一种作品出现复译现象。³¹

三

晚清以降至民国时期，翻译在中国文学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佐哈尔认为在下面三种情况下，翻译文学占据主导地位，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当这个多系统还没有完全形成，也就是该文学是处于“年青”或是正在建立中的阶段；二是该文学是处于“边缘”或“弱势”的阶段；三是该文学正处于“危机”或转折点，甚至是处一个文学真空（literary vacuum）的阶段。³²晚清及“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在推动中国文学、政治、社会发展方面就起了主导作用。通过翻译这一媒介，中国社会在各种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意识形态处于多元化的状态。1949年以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一元化”使当时的中国社会构建成一套自足的、稳定的社会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再指望如晚清、民初时通过文学翻译的作用对自己的系统产生影响的可能性非常小。翻译在文化系统乃至文学系统中³³已滑落至边缘地位。

在包括翻译家在内的文艺工作者被纳入“体制”之内，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之后；在一系列政府机构、文艺单位建立起来之后；在文学翻译、出版等一系列活动被组织、计划化之后，翻译文学作为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地位

³¹ 同上，页 190—191。

³² Itamar Even-Zohar,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200—201. 中文译文参见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界中国翻译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页 23。

³³ 1949 年之前的文学史著作中，都辟有专章论述翻译文学，而 1949 年之后各种文学史材料则不提翻译文学。其中一个深层原因，就是认为中国新文学已经基本确立，翻译文学史是外国文学，自然不能在其中占一席之地。（同注 29，页 562。）

得以加强。对内，翻译（外语）“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工具”³⁴，同时要“适应”“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³⁵；对外，翻译要一面做“‘一边倒’的带路人”，一面做“反帝的前卫”³⁶。翻译工作变成了“一个政治任务”³⁷。

1954年8月，中国作协召开了“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体现在讨论的两大主要问题上，一是如何把全国的文学翻译工作者，在发展文学翻译工作的任务之下，更加团结地组织起来，更加有计划地来进行翻译工作。同时不仅注意潜在翻译力量的发掘和组织，还要注意翻译后继力量的培养；二是提高文学翻译质量问题。³⁸茅盾的纲领性报告《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就主要是围绕这两方面展开的。在谈到“文学翻译工作必须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³⁹时，茅盾说：“翻译工作中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和缺点，而首先是工作的无组织无计划状态。”⁴⁰对过去那种由“译者个人主观好恶”⁴¹、“私营出版商”⁴²来决定翻译什么作品的现象需要改变。在“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一切经济、文化事业已逐渐纳入组织化计划化的轨道，文学翻译工作的这种混乱状态，决不能允许继续存在。文学翻译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主管机关和各有关方面，统一拟订计划，组织力量，有方法、有步骤的来进行。”⁴³为此，茅盾提出了将文学翻译进一步计划化的几项措施：

首先我们必须有一个全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共同拟订的统一的翻译计划，然后由国家及公私合营的文学出版社和专门介绍的《译文》杂志，根据现有的力量和可能发掘的

³⁴ 1962年，陈毅对外语院系的学生作过一次讲话，讲道：“不要把外语工作看得太简单，不要把外语工作看作技术工作。外语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页383）。

³⁵ 沈志远《发刊词》，页2。

³⁶ 孙思定《翻译工作的新方向》，见《翻译月刊》，1949年第1卷第1期，页3。

³⁷ 金人《论翻译工作的思想性》，见《翻译通报》，1951年第2卷第1期，页9。

³⁸ 孟昭毅、李载道《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288。

³⁹ 同注7，页5。

⁴⁰ 同上。

⁴¹ 同注7，页6。

⁴² 同上。

⁴³ 同注7，页8。

潜在力量，分别依照需要的缓急、人力的情况，和译者的专长、素养和志愿，有步骤地组织翻译、校订和编审出版的工作。⁴⁴

其次“进一步解决组织力量的问题”⁴⁵，包括：

文学翻译工作者的极大部分是在业余从事翻译的.....这一些业余的力量，如果组织得好，也仍有可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例如高等学校的许多外国语文与外国文学的教育工作者，有很大的可能把外国语文与外国文学的研究工作与翻译工作结合起来。引外，各机关及各团体内业余的文学翻译工作者，亦复不少.....我们希望通过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同志进一步了解和组织全国的力量，把许多翻译工作者的个人计划，集合而组成一个统一的计划，把分散的力量，组织成一个步调一致的广大的队伍。⁴⁶

完成这一任务的办法需要“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出版总署领导下，由作家协会、有关的文学研究机关、文学出版机关、刊物编辑部和全体文学翻译工作者共同来执行”⁴⁷。这次会议把翻译工作的重要性上升到事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高度；对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加强组织和领导成为“党和国家”紧抓不懈的地方。同时，针对具体的文学翻译，茅盾的报告指出了其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真正走上了计划化的道路。”⁴⁸

这样，在多数情况下，翻译文学的话语只有归避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中才能得到言说的权力。翻译失去了那种把各色各样的意识形态及诗学引进来的重要功能，翻译工作成为可以利用来巩固“一元化”意识形态下的文学、文化系统的工具，诸多无助于建构主流意识形态及从“诗学”、审美层面能够丰富译入语文学话语的外国文学作品被抛弃在文学翻译的视野之外。政治意识形态成为文学翻译择取的首要标准。

⁴⁴ 同上。

⁴⁵ 同注 7，页 9。

⁴⁶ 同注 7，页 9-10。

⁴⁷ 同注 7，页 10。

⁴⁸ 同注 30，页 192。

一些著名翻译家因为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控，而在翻译活动上出现了明显的转向。比如 1950 年代后，傅雷（1908—1966）把译介对象主要集中到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的文学作品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巴尔扎克是曾受到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推崇的作家。即使傅雷可以因其作为著名翻译家声望而能够不领“作协”工资，仅靠翻译稿酬谋生，但这并不是说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审美倾向、个人喜好来选择作品翻译。⁴⁹1950 年代初，随着国家对出版机构实施整顿和改造，私营出版社逐渐被取缔，若想仅凭翻译稿酬谋生⁵⁰，译者的翻译活动（包括译什么，怎么译）就得符合当时的翻译规范，当然首先是翻译选择的规范（Norm），个人的审美因素受到压抑是必然的。傅雷自己就曾说过：“至于罗曼·罗兰那一套新浪漫气息，我早已头疼。此次重译，大半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爱好。”⁵¹而当时负责出版傅雷全部译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⁵²，包括也曾发表过傅雷译作的杂志《世界文学》（《译文》）均属于国家级、“体制”内出版发行机构——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隶属于国家出版

⁴⁹ 有关傅雷的翻译活动，可参考拙作《论“十七年”文化语境中傅雷的翻译活动》，见许钧主编《傅雷的精神世界及其时代意义》，北京：中华书局，2011，页 66-81。

⁵⁰ 1949 年以后，中国稿酬制度的正式制定是在 1950 年 9 月 25 日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之时。但当时各出版社的稿酬标准尚未统一。就人民教育出版社而言，据叶圣陶日记所记载：“一般书稿每千字 7 万元至 11 万元定额自 1 万册起至 8 万册，视印数之多少而定。教科书稿自 15 万至 30 万元，一次付讫，不计印数。翻译科拟定定额翻译，超额另致稿费。”1958 年 7 月，文化部颁发的《书籍稿酬暂行规定草案》才算是正式制定了统一的稿酬标准。当时的标准为：著作稿每千字为 4 元、6 元、8 元、10 元、12 元、15 元。翻译稿为每千字 3 元、4 元、5 元、6 元、8 元、10 元。（马嘶《百年冷暖：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页 373。）包括傅雷等翻译家对稿酬偏低有意见。1957 年 9 月 27 日的《文汇报》上刊载了姚文元《论稿费》一文，特点了傅雷的名，说：“自命‘清高’的傅雷，在争稿费上就是一员猛将，有些人以‘按劳付酬’为自己的‘创作原则’，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⁵¹ 傅雷《翻译书札·致宋淇》，见怒安《傅雷谈翻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页 43。

⁵² 1952 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傅雷签约，其译作全部归该社，出版社则预支稿费以维持生活。1958 年傅雷被打成右派，当局同意他继续翻译，但不能用真名出书，被傅雷拒绝。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意继续支付稿费，但把他的译稿压下，直到傅雷摘去右派帽子后才陆续出版。（同注 28，页 69。）

总署、文化部等部门⁵³，《世界文学》（《译文》）编辑部则是由中国“作协”直接领导——从狭义讲，这些出版发行机构、杂志社即是傅雷通过翻译活动以谋求经济来源的直接“赞助人”（Patronage）。作为翻译家的傅雷在选择译本时所享有的权利，也只能局限于在“赞助人”所提供的译品来源中进行筛选。

当然，一些体制外的翻译家也许可以按照自己的个人审美爱好做翻译选择，但他们的译作在当时就不可能出版。比如查良铮（1918—1977）在1958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剥夺了教职，受到管制、批判。其后他赋闲在家，专事文学翻译，花了8年时间翻译拜伦的《唐璜》。“文革”后期，又翻译了苏联现代主义诗人丘特切夫（Fyodor Ivanovitch Tyutchev, 1803-1873）以及英国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奥登（Wystan Hugh Auden, 1907-1973）等人的诗。查良铮此时已是“体制”外的翻译家、诗人，可以在自己的个人空间里翻译自己真正喜爱的作品，但其翻译作品在当时不可能获得出版。一方面由于他的“历史反革命”的政治身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所翻译的是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不符合当时的文学翻译选择规范。⁵⁴

建国初期，文学翻译工作者比较普遍地将翻译与政治直接联系起来，正如著名翻译家金人（1910-1971）所言：“翻译工作是一个政治任务。而且从来的翻译工作都是一个政治任务。不过有时是有意识地为政治服务，有时是无意识地为政治服了务。”⁵⁵

（崔峰，男，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讲师，
cuifeng@ntu.edu.sg）

⁵³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营业执照由当时的政务院财政委员颁发（1951.6.23.）。

⁵⁴ 查明建《意识形态、诗学与文学翻译选择规范——20世纪50—80年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翻译研究》，香港：岭南大学博士论文，2003，页64。

⁵⁵ 同注37，页9—10。